

人民日报批评城市“贵族化”倾向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城市化应体现人本 方便生活

一些地方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模式,忽视城市服务功能建设,大楼越造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这种“贵族化”倾向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建筑洋了,特色没了

记者在一些地方采访时发现,当地展示“城市名片”的方式几乎千篇一律——一辆车把参观者拉到新开发的近郊新城区,新城往往整洁优美,豪华办公楼、会展中心、主题广场、体育馆、图书馆、规划馆、亮化美化工程,甚至高尔夫球场、度假村等,一个都不少。

城市形象过度求新、求大、求洋,一些地方就大拆大建。这样大拆大建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还时常发生野蛮拆迁、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

大型公共建筑往往投资大、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建筑能耗高,成为资金、土地、能耗的黑洞。

档次高了,生活难了

在不少城市,教育、医疗、文化和体育等公共服务行业都出现了高端化、贵族化的倾向:一方面,很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满足,例如,普通患者为了看病,需要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一些城市的新区发展起来后,长期没有建设配套的中小学和医院,导致“上学难”、“看病难”;普通居民缺乏足够的体育活动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中出现了很多高档病房,学校中出现了高收费的高档班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贵族化”倾向。一种类型是基本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社会力量兴办的教育或私立的医疗单位提供的较高档次的服务。这种类型的服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那些高收入家庭或群体,很大程度上具有私人物品性质。另一种类型是不合理的“贵族化”倾向,就是由政府举办的教育或医院提供的高档次的服务。这种“贵族化”使用的是公共财政资金、公共土地资源和公共人力资源,带有歧视性,应当加以限制。

城市大了,“空间”小了

城市越来越漂亮,但不少人的生存、发展空间却越来越狭窄。有些城市提出发展高端产业,限制小饭店、小商店等低端产业发展。人们担心,这样的发展,会使普通群众的生活更加不方便,也使普通群众的谋生空间更加狭小。

在一些城市,对农民转化而来的“半市民”更是缺少足够的关怀和保障。随着城市化的潮流,每年有1000万—1200万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但他们以及家庭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人民日报

»对话

2月21日,2007年曾经在江苏扬中市挂职担任过市委常委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博士惠双民接受了快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城市化不是为了在人前炫耀,而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能够让这里的人们给后代留下更多的可以传承的文化。



惠双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博士

求华丽的外表,但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却没了。一座老房子,一棵古树,可以让我们回想到久远的历史、先辈们曾经做出的贡献,以及给我们留下的好的传统。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其人文的传承上,并不是以到处可见的高楼大厦来显示的。城市化不是为了在人前炫耀的,而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能够让这里的人们给后代留下更多的可以传承的文化。

现代快报:城市表面的繁华和普通百姓生活不便是一对矛盾,矛盾产生的原因在哪里?

惠双民:最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更重要的是政绩的行为,上级领导看到你有高楼大厦,认为你有政绩。

然而,如果是让当地老百姓投票的话,他们肯定更多的是喜欢身边有便利的早餐摊点……如果政府和民众作为共同的主体参与的话,那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现代快报: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化,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识。

惠双民:涉及到对现代化的理解,以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忘记了现代化还有人文方面的要求。每个民众在这个时代都应该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社会尽可能提供的便捷生活、幸福的追求。一些地方政府仅仅理解为,城市的现代化只是硬件的现

代化和国际化。可以说,一些城市的硬件已经超过了欧洲城市的硬件了,但是你到欧洲去看一下,人家是软件的人文化、人本化,但这一块我们的城市没有考虑到。我们的一些城市只是考虑到了硬件的评价,却缺少了人本和人文关怀的评价。这显示了一种理念的认识。

现代快报:有专家认为,城市化道路要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一个民主科学的决策平台,让广大市民能广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与实践中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惠双民:我觉得,如何让城市进程真正地反映以人为本,这是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而其核心,应该是民众权利的尊重和民众主体参与这两点,民众在一个城市自由地购买、自由地生活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同时,他们在这个城市作为参与决策的一分子不能缺位。仅仅有一个决策平台还是不够的。习近平副主席讲过,“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这个很重要。

现代快报:城市化应该包括了农民工进城后可能享受的福利。有句话说得好,“农民工进了城,就该安顿好他们”,现实情况却让这些农民工不是很满意。

惠双民:不光是农民工,任何一个外地的企业家来到这个城市都有生活的权利和便利。

快报记者 刘方志

»头条时评

公助民办破解社会养老“瓶颈”是好主意

□江苏 杨红兵

龙志强委员建议:“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做法,公助民办,政府给政策,私人来投资,很多地方建了别墅型的养老院,条件很好,别人公助民办做得很好,我们为何不这么做呢?”

(2月21日《珠江晚报》)

养老已成为现代社会绕不过的问题。据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如此庞大的数据,如果没有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跟进,那么将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是人口老龄化水平越来越高,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

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人口老龄化水平越高,劳动力相应就减少,而赡养老人需要社会支付的养老成本也就越高。当前光征缴养老保险税显然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

基于此,我们应该明白:养老不是一个单纯的孝顺问题,而是一个繁杂的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政府就应当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负“老”前行,如何破解养老的瓶颈,是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多建养老院,多添置床位,加大护理人员的培训,由政府牵头加强对

他们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力度,使他们懂得老年营养学、医学、心理学等必备知识,教会他们一些基本的护理技能。同时让护理人员不仅感觉到所从事职业的光荣,而且物质上也很体面、很有尊严,譬如给他们缴纳双险。

依托社区发展居家养老。譬如为了照料好“空巢”老人,在北京,政府为有需求的老人安装应急救助呼叫器,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有需求的“空巢”家庭老人设立家庭病床,并主动上门提供以护理和康复为主要内容的健康服务。

另一方面建立政府、社会、民间三位一体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政府的资金、资源毕竟有限,养老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政府出

政策、给补贴激励民办养老机构。政府可以对民办养老机构提供各种优惠的政策援助,譬如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用地、报建、日常水电费等,均应给予公办养老机构同等待遇,让民办、公办在一起跑线上竞争。也可以给予补贴帮助,比如选择硬件条件高、服务质量好、管理规范的民办养老机构,以“委托合同”的形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成“民办公助”养老事业新机制。

总之,养老问题牵涉个人、家庭、社会,它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合力解决的问题,因此,搭建政府、社会、民间一体化“民办公助”养老结构不失为破解养老瓶颈的良策。

»热点纵论

教育平权何必限于“优秀外来工子女”

□浙江 浦江潮

据《广州日报》2月21日报道,今年刚刚出台的广州市中小学招生考试工作意见中新增了一项优惠政策:优秀外来工子女可以作为义务教育阶段政策性照顾借读生,享受和广州户籍学生相同的义务教育待遇。

城市公办学校从拒收外来工子女,到限量招收但须交借读费,再到借读费逐步被取消,这么多年来,外来工子女的入学门槛确实越来越低。不过门槛依然存在,差别性待遇尚未消除,外来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依然很难,借读费被取消后,有些学校又收起了赞助费。

广州市出台的上述优惠政策,意在教育平权,给借读生以户籍生待遇,但却仅限于“优秀外来

工子女”——“优秀外来工子女”这个称谓让人有些费解,不知是指“优秀外来工的子女”还是指“外来工的优秀子女”。如果是前者,哪些外来工子女能享受优惠政策,事先需进行优秀外来工评选;如果是后者,则需事先对外来工子女进行考核。这两者都是费时费力的事情,不知道广州市有无具体评选或考核方案,优秀的标准如何确定,能否保证公平公正。

优惠政策本意在于消除借读生和户籍生的差别性待遇,是走向公平之举,却又有意无意地在借读生之间制造出差别性待遇。“优秀外来工子女”的另一面是“不优秀外来工子女”,少数外来工子女享受户籍生待遇,相当于

视同仁地向划拨义务教育经费,让外来工子女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的阳光雨露。

“用工荒”愈演愈烈,企业招不满工,急得焦头烂额。企业着急,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却不急,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宁肯让公办教育资源闲置、减少招生数量也不愿惠及外来工子女,这是眼下一些城市的通病,足可见户籍歧视的政策在这些地方难以绝迹。缓解“用工荒”的要素之一,就是想办法解决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仅仅是着眼于本地经济的发展,各个城市也应该这样做。更何况,从教育公平的大角度而言,一视同仁更能彰显城市的胸怀。

»今日视点

张静们抄袭论文 谈不上学术道德问题

□河北 张军瑜

“见过评职称抄论文的,没见过抄得这样明目张胆的。”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收到读者许隆洋(化名)的来信称,他经调查发现,山东省枣庄电视台副台长兼广告中心主任张静参评副高级职称的10篇论文,竟然都涉嫌抄袭,有的篇目甚至“通篇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

(《中国青年报》2月21日)

涉嫌抄袭论文的新闻很多,有硕士、博士毕业的高材生,有大学的教授,有公务人员,也有企业高管,各行各业都有被涉及到的“新闻主角”。

我不想再去从什么学术道德上来声讨张静。因为张静本身就是在电视台拉了五六年的广告,距离学术这么高雅、高深的东西估计还很远。世界上像张静这样离学术很远的人很多,三百六十五行,并不是要每行都得是学问家。

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穿衣,都想拿更多的工资。比如说张静,这个人可能很擅长拉广告,但她未必就能写出论文来,要不她也不会被人揭发涉嫌突击抄袭10篇论文。所以说,实际上业务能力很强的张静,未必就能评上副高级职称,也就未必能拿到相应的高工资。因为这些基层单位的人员基本不做研究,要他们写论文纯粹是赶鸭子上架,但是要想提升待遇,又必须提职称。于是,张静或者张静们就选择了铤而走险去抄袭论文。没有这样的能耐,却非要动这样的心思,实际是另外一种巧取豪夺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道德的问题。这种在利益驱使下的不择手段,是对科学体系的蔑视,在他们的眼中,职称仅仅是获利的敲门砖而已。

每当一个张静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表现得义愤填膺,恨不得把张静们给按到历史道德耻辱架上用钉子给楔住。但是,我们似乎也应该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张静们会层出不穷?